

清代前期

市谷貿易

研究

蒋建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研究

蒋 建 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研究

蒋建平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0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200 册

ISBN 7-301-01562-3/F·0132

定价:3.70 元

目 录

绪论.....	1
一、发展过程的宏观考察	16
二、商品米谷的基本流向	33
三、主要商品米谷供给地	42
四、主要商品米谷需求地	80
五、主要商品米谷集散地	132
六、米谷价格波动	157
七、米谷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204

绪 论

(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商品经济的历史极其悠久。传说,远在唐尧虞舜时代,商品交换活动就已比较频繁。舜就曾经亲自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尚书·大传》说:舜因“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

在我国悠久的商品经济发展史中,粮食贸易无疑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这可能是粮食本身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使然。粮食贸易活动出现相当早,发展亦相当迅速。《尚书·皋陶谟》记载说:虞舜时代,洪水泛滥,禹佐舜治水,建议舜“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义”。根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解释,“懋”是贸易的意思,“迁”是迁徙的意思;“懋迁有无,化居”,就是通过贸易活动来安定民众生活。这里贸易的物品是什么呢?联系上下文来看,显然是指粮食。司马迁也认为是指粮食。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说:“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贸易活动来使受灾民众得到粮食。由此可见,早在虞舜、夏禹时代,粮食贸易就已产生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粮食贸易活动日益频繁，贸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自这时起，粮食就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最为大宗的贸易物品之一，后来几乎拥有全国性的广大市场；而粮商也就成为商人中最为活跃的一分子，拥有相当庞大的经济势力。我国古代的许多著名商贾，都曾经以粮食贸易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经营活动。例如：春秋末期的著名大商人陶朱公（即越国名臣范蠡，后弃官经商，因隐居陶地、自称“朱公”，而被人们称为陶朱公——作者），历来被商人奉为一面旗帜。《史记·货殖列传》说他是一个“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他之所以能够经商致富，主要是运用了“计然之策”。所谓“计然之策”，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其二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前一部分直接就是粮食贸易问题，后一部分也有许多内容与粮食贸易直接或间接有关。战国时期的著名大商人白圭，历来被商人奉为鼻祖。他的一整套商业经营管理思想，几乎就是以粮食贸易问题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史记·货殖列传》中简略地提到了白圭的经商之术，说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欲长钱，取下谷”。白圭首次提出从农业收成上预测商品的价格变化和供求变化，主张：“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凶，取帛、絮，予之食”。可见，白圭也是很重视并很善于经营粮食贸易的，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以经营粮食贸易为主，以经营其它商品为辅的大商人。

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一度很兴盛，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而这些大商贾中，有不少就是经营粮食贸易起家的。例如：秦汉之间的宣曲任氏，就是靠囤积粮食发家致富的。

《史记·货殖列传》说：“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珠玉，而任氏独力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毫无疑问，任氏是一个专营粮食贸易的大粮商。

汉以后，许多商品的贸易活动时有兴衰，起伏较大，但粮食的贸易活动却一直较繁荣，未见明显跌落。唐代、宋代、元代，有关粮食贸易的记载都屡见不鲜。尤其是商业繁荣的宋代，粮食贸易的记载更多。宋代的很多城市中，都可以看到频繁的粮食贸易活动。例如，北宋时，汴梁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当时汴梁的商业活动中，粮食贸易无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宋史》卷260载李怀忠的话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也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同书卷281还记载，“熙宁十年四月丙戌”诏，“访闻昨水利司于淮南收籴下小麦万数不少，……即指挥水利司并淤田司将籴到数目，令逐司并津置赴京出籴”。另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也谈到：“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马可·波罗行纪》中也谈到过宋元之际杭州的粮食贸易。其中记载道：“你在街上所遇见的种种式式的行人常常都是这么拥挤，实在没有人相信能有充分的粮食来供给他们的消费，除非他们看见每一市日，市场各处拥挤着购物者和从水陆贩运粮食来卖的商人，以及一切运到的货物全都售罄的情形。”

历史前进到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加速，粮食贸易更是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繁荣。明代时，长江流域各省，尤其

是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粮食贸易活动都很频繁。例如：当时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徽州地区，所需粮食“大半取给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贾从数千里转输”。^①天启年间，江西南部的赣州已是著名的粮食外运地区，“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②

至于清代前期(1840年以前)的粮食贸易，则更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总的来看，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第一、涉及地区广阔。

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前期粮食贸易所涉及的地区是相当广阔的。南到两广、云南，北到东北，东到台湾，西到甘肃、新疆，几乎全国的所有省区都曾经出现过粮食贸易活动。尤其是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粮食贸易更是异常活跃，屡见不鲜。这些地区，无论城市、农村，亦无论平原、山区，甚至包括一些交通极不发达的偏僻之地，都可以看到频繁的粮食贸易活动。

第二、贸易量大。

从历史记载来看，粮食无疑是当时最为大宗的贸易物品之一，其贸易金额甚至远在棉布、食盐、丝绸、茶叶之上。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估计，在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银两，其中粮食占42%，棉布占24.4%，盐占15%，以下依次为茶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当时，“在城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2，江南平物价议。

② 天启《赣州府志》卷3，舆地志三。

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 245 亿斤,占产量的 10.5%”。^①

雍正、乾隆年间,汉口、苏州、重庆、湘潭、长沙、九江、棕阳(今安庆——作者)、芜湖等地的粮食贸易成交量,动辄就是几万石、几十万石,甚至上百万石。雍正 10 年,湖广总督迈柱奏报:“汉口地方,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初旬,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而盐商巨艘装运者,尤不可以数计”。^②雍正 12 年 7 月 8 日,迈柱又奏报:汉口地方,“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③ 上述所引资料虽然不很具体、准确,但即此也足以窥知,当日汉口米市的粮食贸易成交量是相当可观的。汉口一市的粮食贸易规模如此庞大,全国的粮食贸易规模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第三、形式多样。

当时经营粮食贸易的,或者说参与粮食贸易活动的,既有官府,也有私人;私人中,既有商人,也有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商人中,既有专门从事粮食贸易的粮商,也有夹带经营粮食贸易的盐商、布商以及其他商人。官府经营粮食贸易,一是为了买补官仓,进行储备,二是为了赈济灾民,临时救荒,不完全是商品经济性质。而私人经营粮食贸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商品经济性质,看来是无疑问的。

第四、运程远。

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的粮食贸易,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远途贩运的异地贸易,其中主要是省际贸易。据吴承明先生估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3 页。

② 《朱批谕旨》,迈柱雍正 10 年 2 月 24 日奏稿。

③ 《朱批谕旨》,迈柱雍正 12 年 7 月 8 日奏稿。

计,在清代前期的商品粮总量中,长距离运销所占的比重一般约为 21.6%,即年运销量为 3000 万石,约合 45 亿斤。^①(不含漕粮——作者)

运程远,是清代前期异地粮食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运程一般长达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例如: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顺流而下至江苏、浙江,并间道至福建;湖广的米谷经汉水北上至河南、陕西;江浙的米谷沿海北上至山东、河北;江南的米谷和小麦经大运河北运京畿、山西、陕西;奉天的大豆和小麦海运山东、江南;台湾的米谷过海峡至福建;江西、福建、广西的米谷由水旱两路,间道运广东;河南、河北的小麦和高粱,运销山东临清,……等等。

第五、牵涉面宽。

当时的粮食贸易,几乎把社会上的所有阶层都牵涉进去了。从参与粮食贸易的供给者方面来看,不仅涉及到家有余粮的地主、富农和自耕农,而且还涉及到众多家无余粟的贫苦农民。从参与粮食贸易的贩运者方面来看,不仅涉及到粮商,而且涉及到许多其他商人和官府。至于参与粮食贸易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则更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当时购买和消费商品粮的,有官府的官员和兵丁,有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其他居民,也有许多农民。有的农民是因为本身粮食不足,需要购米下锅,属于纯粹的购买者。而有些农民则是兼具出售者与购买者双重身份,他们往往在收获季节售出粮食,在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又购进粮食。由于粮食贸易直接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因而它就必然具有足以影响社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259 页。

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而由于它具有足以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因而它也就必然会引起官方和全社会的密切关注。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的官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官,都是很注意粮食贸易动向的。康熙帝在他当政的晚年,曾多次谕令某些地方官奏报粮食价格变动的情况。雍正帝更是三令五申,谕令各级地方官随时奏报当地粮价,并要巡查各地的中央政府官员实地调查粮价。乾隆帝多次谕令各级官员奏陈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且还在策试天下贡士时,亲自向来自全国各地基层的知识分子面询有关粮食贸易的各种问题。

第六、形成了稳定而庞大的交易市场。

我国粮食买卖的历史虽然由来已久,但大型粮食交易市场的形成却并不很早。大型粮食交易市场的形成究竟始于何时,尚缺历史资料证明,但根据现已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明清时期已有省级规模的或地区中心级规模的大型粮食交易市场出现,则是毫无疑问的。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前期,随着商品经济和粮食贸易的迅速发展,全国的许多城市中,甚至一些集镇中,都出现了专门进行粮食贸易活动或主要进行粮食贸易活动的比较稳定的交易市场。有的交易市场,甚至拥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和影响力,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汉口、苏州、重庆、长沙、湘潭、九江、芜湖、安庆、无锡等就都是全国驰名的米市。牛庄(今营口——作者)也是享誉天下的豆麦市场。此外,北京、天津、临清、福州、漳州、泉州、扬州、镇江、萧山、宁波、温州、广州、成都、梧州、桂林、衡阳等地的粮食交易市场,也都颇具规模和影响力。明清时代,我国已有许多商品,如药材、棉布、丝绸、茶叶、铁

器、瓷器等,形成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但其数量都不如粮食市场多,规模都不如粮食市场大,地位也都不如粮食市场稳固,作用和影响力则更是无法与粮食市场相提并论。

总之,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已发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二)

“粮食”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出版的《生产年鉴》开列的大宗粮食产品目录,就多达八大类一百余种,即:(1)谷物类 8 种;(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 5 种;(3)豆类作物 5 种;(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 13 种;(5)蔬菜和瓜类作物 20 种;(6)糖料作物 3 种;(7)水果、浆果 24 种;(8)家畜、家禽、畜产品 28 种。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把粮食的一个主要分项表示为:谷物和薯类。

我国传统的解释,历来都把粮食与谷物类划等号。《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都把粮食解释为“谷食”,即禾本科作物。

我国的占主流地位的食物结构,很早以来便是以含淀粉较多的谷物类为主,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谷物类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常被人们作为食物来源的,就有许多种。例如,中国古代早就有所谓“百谷”、“五谷”、“六谷”之说,而关于“百谷”、“五谷”、“六谷”的解释又有很多种。《吕氏春秋·审土篇》列举了粟、黍、稻、麦、豆、麻等六种。《周礼》列举了黍、稷、稻、粱、小豆、大豆、大麦、小麦、苽等九种(据郑玄注)。那么,究竟哪一种粮食作物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呢?或者说,在古代中国人的粮食消费中,究竟哪一种粮食作物所占的比重最大呢?

从史料记载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黍(即现代的黍子,又叫黄米,状似小米,色黄,有黏性——作者)、稷(即小米,北方人常称为谷子——作者),尤其是稷,曾经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以“稷”为谷神,以“稷”为“五谷之长”^①,决非偶然。但是,秦汉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小麦、大麦、稻等粮食作物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稻原产中国(一说原产印度——作者),在中国的种植相当早,可能始于周代,但由于它的种植受水利和土质的局限较大,作业也较复杂,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发展不很快。历史上,“稻”与“粱”常常连言以代表最精美的主食。《诗经·唐风·鸛羽》说:“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杜甫《壮游》诗说:“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可见,当时,稻是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吃得起的。但是,自北宋起,由于优良稻种的引进和不断改良,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稻的普及日益加速,很快便压倒其它粮食作物,而成为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宋应星在其科学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卷1中指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稷(小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宋应星是明末人,《天工开物》成书于崇祯年间,所说情况当然是明末的。可见,在明末时,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古代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的食物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发展变化的进程极为缓慢,更不可能出现骤然的改变,在

^① 《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

一、二百年时间内不可能有明显的变化。根据历史记载来看,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大量湖田的开发,水利的兴修,品种的改良,双季稻的推广,水稻的种植面积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不断提高,因而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清代前期,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米谷在全国的粮食消费总量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作的对明代的估计,大体上也适用于清代。

正是由于水稻在粮食作物中,在人们的食物结构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因而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中,米谷贸易格外突出,格外引人注目。当时全国所有的粮食交易市场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是米市。当时全国所有从事粮食买卖的商人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是米商。当时所有粮食的价格中,最为人们所注意的是米价。当时政府官员的奏稿、公函和文章中,谈论米谷贸易的内容远比谈论其他粮食贸易的多得多。至于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封建帝王的谕旨中,则更是少见谈论其他粮食贸易的内容,却不乏谈论米谷贸易的内容。雍正《朱批谕旨》中,有不少奏稿和批示就是专为米谷贸易而发。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主要就是米谷贸易。

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中,曾对鸦片战争前的远程粮食贸易数额做过具体分析和估算。他说,当时总计有 10 条远程粮食贸易主要路线,即:(1)米麦经大运河北运京畿、山西、陕西。总计由大运河北运者,可估为 600 万石。(2)奉天麦豆海运天津、山东,共可估为 100 万石。(3)奉天豆麦海运上海,可估为 1000 万石。(4)河南、天津麦梁运山

东临清,大约数十万石。(5)汉口麦谷经汉水运陕西,估计共约60万石。(6)安徽、江西米运江苏、浙江,估为500万石左右。(7)湖南、四川米谷经长江运江苏,约1000万石。(8)江浙米由上海运福建,并入下项总算。(9)台湾米海道运福建,加上上项江浙米,不会少于200万石。(10)广西米经西江运广东。总看广东由广西、湖南、江西运进之米,每年大约有200万石。总计以上10路,年约3600万石^①。这10路中,(6)、(7)、(8)、(9)、(10)等5路纯为米谷;(1)路中有500万石是漕粮,多为米谷;(5)路中也有不少米谷;总算一下,当时每年3600万石左右的远程粮食贸易量中,至少有2200万石是米谷,占61%以上。

米谷贸易在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决定了清代前期粮食贸易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性质。因此,如果不深入研究米谷贸易,就根本不可能搞清楚清代前期的粮食贸易。这是毫无疑问的。

稻是水田作物,对水利条件要求高。由于受到水利条件的限制,北方和西部各省,尤其是山地、高原和高寒地区,都不适宜、甚至不能种植水稻。从历史记载来看,自古以来,我国的水稻主产区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尤其是川、湘、赣等长江流域各省。在清代前期,这种种植格局仍未根本改变。由于水稻主要种植在南方,因而米谷贸易也主要在南方进行。清代前期闻名天下的米市,如汉口、苏州、长沙、芜湖、九江、安庆等,几乎全都集中在长江流域。这决非偶然。因此,所谓清代前期的米谷贸易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是南方各省的米谷贸易问题。如果不深入研究清代前期南方各省的米谷贸易,就根本不可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55页。

能搞清楚清代前期的米谷贸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三)

清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开始集中暴露,逐步尖锐;封建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明显放慢,失去活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获得了一定发展,社会更替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外国资本主义开始试探和叩击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日益突出。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应当承认,我们对于清代前期的历史是缺乏研究的。在清史研究中,对于商品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米谷贸易史的研究,则更是明显落后。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米谷贸易问题予以足够的注意。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似乎米谷贸易问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一提起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他们所想到的,往往只有铁器、瓷器、丝绸、棉花、土布、茶叶、药材、烟草等等,却很少涉及米谷贸易及其他粮食贸易。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偏见。

粮食贸易,尤其是其中的米谷贸易,是商品经济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前期,米谷贸易问题在商品经济中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格外引人注目。米谷贸易问题就象是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常常牵动全局,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躯体震颤不已。因此,深入研究清代前期的米谷贸易问题,揭示它兴衰变化的背景、过程、后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问题,无疑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

米谷贸易的前提是米谷生产,米谷生产的基础是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科学技术。因此,对米谷贸易的研究,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例如:有清一代,劝垦最力,耕地面积的扩大旷越前朝。那么,清代为什么要大规模开垦荒地呢?它与米谷贸易有无必然联系?它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清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人口迅增的基础。那么,米谷贸易的兴衰与人口增长有无必然联系呢?一般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民家庭剩余农产品的数量,而农民家庭剩余农产品的数量又直接决定着农产品贸易的规模。那么,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的兴盛是不是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呢?如果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确有提高,那么,导致提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耕地、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清代前期,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可以肯定,深入开展米谷贸易的研究,对于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是很有益的。

清代前期是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是无庸置疑的。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农业生产。而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又居于核心地位。农民生产粮食从来只是为了交租纳赋和自己食用,而不是为了出售。地主从农民手中收取高额的粮食实物租,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而不是为了经营谋利。为什么在清代前期,作为自然经济核心生产的粮食会大量流向市场而成为商品呢?应当怎样估计这一现象的性质和作用呢?清代前期米谷商品化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自然经济开始大规